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寿思华 著

MAOZEDONG JINGJI FAZHAN ZHANLUE SIXIANG YANJIU

线装书局

海外版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寿思华 著

线装书局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 寿思华著. — 北京: 线装书局

ISBN 978-7-5120-2520-2

I. ①毛… II. ①寿… III. ①毛泽东思想—经济战略—战略思想—研究
IV. ①A841.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303438 号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作 者: 寿思华

责任编辑: 李 旻

出版发行: 线装书局

地 址: 北京市丰台区方庄日月天地大厦 B 座 17 层 (100078)

电 话: 010-58077126 (发行部) 010-58076938 (总编室)

网 址: www.zgxsj.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制: 北京兴湘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22

字 数: 316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8.00 元



线装书局官方微信

序

毛泽东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伟大的思想家、理论家、政治家、战略家。从他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来看，说他是经济学大家，当之无愧。

有人说毛泽东不懂经济，不懂经济发展规律。我认为这不是实事求是。

看一个人懂不懂经济，不是从他是否读过什么样的经济类大学，读过多少经济学教科书，拿了什么样的证书文凭来衡量的，而是从他的实践，从他参与和领导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从他的工作和生活，反映出来的。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是博大精深的毛泽东思想理论体系的组成部分，应该说，是毛泽东思想中正在开拓和正待开拓的宏大的领域。对于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要认识它，研究它，掌握它，充分运用它，是一个极大的科学问题，需要有足够的智慧和勇气。不管人们的认识如何，这只是迟一点或早一点的问题。

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始自大革命时代，始自于我国革命的最为艰难时期。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和战略家，在理论上和在实践中，不仅只是思考当时革命战争的需要，思考到革命和战争的持续和长期的需要，更是思考到革命胜利后国家的建设、发展、富强的需要。因而，我们从毛泽东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历程去看，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建设时期，无论我们的党，我们的军队，我们的国

家，我们的人民，遇到了什么样的困难，毛泽东和他的领导集体，总是有办法，让党、军队、国家和人民能够从容渡过难关，有惊无险。这其中，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毛泽东的核心作用功不可没。这是历史事实所证明了的。

毛泽东首先作为伟大的无产阶级政治家，他不仅在理论上钻研经济，在实际上重视经济工作，而且告诫、教育和帮助那些对经济业务认识不足，或忽视经济问题的各级领导者，要求他们从实际上、从需要的角度上去重视经济业务工作，要努力学习，使自己成为一个懂得理论、懂得人民、懂得国家、精通业务的领导者，毛泽东并以自己的学识和经验，教他们以方法。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具有科学性、实践性、变通性、开放性、人民性、可持续性。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有许许多多的特点，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人民性。他自始至终把经济问题放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经济发展成果让人民共享之上。

毛泽东浩如烟海的著作中，经济专著的比例不大，但几乎每一篇著作都涉及经济发展方向的问题，这确是不争的事实。假若人们能够更多地理解毛泽东，更多地理解毛泽东开创的伟业，更多地理解毛泽东所做的一切，就一定会理解中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含义，会理解我们的前人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艰难探索，从而提高对我们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自信，提高对我们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自信，提高对我们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的自信，提高对共产党领导的自信，提高对中国人的自信，提高对中华民族的自信，提高对中华民族的振兴和中国繁荣富强的自信。

印度人苏巴什·钱德拉·萨卡尔在他的文章《毛泽东：国家自力更生的倡导者》中指出：“光靠军事力量是不会使毛取得他一生所取得的那种重大成就的。这种重大成就更多的是由毛能够为中国开辟发展经济的新道路，这必然使中国成为正为民族尊严、为经济和文化平等而斗争的其他许多国家人民的榜样。”“毛以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真正创造性方式，强调必须根据一个国家能获得的人力和物力资源来制定发展的

战略”（均引自《举世悼念毛泽东主席》，新华通讯社编译，人民出版社1978年2月版第224页）。

毛泽东不仅为我们国家的发展进行了艰苦的探索，而且探索有了丰硕的成果，这是我们党、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亦是世界性的财富。

恕难尽言，仅此寥寥数语，是为序。

作者

2015年12月26日于广西南宁

目 录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1)
试论毛泽东的文化大战略思想	(24)
浅论毛泽东的兴农战略	(45)
论毛泽东工业发展战略思想	(84)
论毛泽东科学技术发展战略	(139)
论毛泽东经济改革和经济管理战略思想	(195)
论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与政治关系的战略思想	(268)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研究

[摘要] 文章认为，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人民性、有益性、交流性和政治性的特点。第一，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是从民生出发，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让人民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第二，发展经济就是要做好对富民强国、社会和谐有利有益的事。第三，在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的战略思维里，“交流”是作为学习和推进健康发展的方式方法和手段，是自由平等的合作和融合，是公平公正公开正义的互利互惠。这与资产阶级所追求、所进行的交流在本质上不同，在方式上也有差异。第四，毛泽东认为，发展经济不仅是个经济问题，也是个政治问题，解决经济问题，要有政治智慧。发展经济，处置经济发展及其他关系问题，需要运用政治智慧。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的政治性，更多地体现在为经济基础服务，以及给予经济发展以巨大的影响力方面。

[关键词]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人民性；有益性；政治性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理论家，是卓越的军事家、哲学家、书法家和诗人。毛泽东是战争规律和战略的探寻者、成功者。毛泽东在经济发展理论和战略思维上，也有着独到精辟的看法和论述。在他的有生之年，他领导的经济建设发展实践，有着许许多多的奇迹产生，积累和留下了许许多多宝贵的成功经验。而且，这些奇迹和经验，都是在十分恶劣的战争环境，在被西方列强包围、封锁的十分困难的条

件下创造出来的。我们把毛泽东誉为现代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战略的伟大开拓者，称他是一个十分有造诣的经济专家和经济学家，也是非常适宜的。在毛泽东逝世时，缅甸《劳动人民日报》有文章指出：“毛泽东的思想和智慧是正确的……对于毛泽东的作为和思想，虽然有些人不一定赞同，但没有人能对他为中国人民所做的辉煌贡献提出异议。”辉煌贡献肯定应当包括对经济建设发展方面的贡献。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是真正的符合中国具体国情的，符合中国人民意愿，符合战略提出时中国的时代要求。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人本性、有益性、交流性和政治性的特点。这些特点既系统又具体，而且可直接操作。本文试图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结合社会主义中国的具体情况，对毛泽东经济战略思想进行论述，是为抛砖引玉之作。

一、毛泽东经济战略思想具有很强的人民性

毛泽东经济发展战略思想和发展经济、抓经济工作的动机，直接地就是为了人民，依靠人民，让人民能够共同分享经济发展成果。

发展经济，其出发点、落脚点及其整个过程，都是为了上述动机和实现上述目的的，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以老子和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具有普遍的公理性，它能适应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两千多年前老子就强调“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让人民将面临的事业当成自己的事业，从而积极投身其中，才能把事情干好。提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只有更多地为人民，对人民有益的事业方可向前推进。我们无论是从西方哲学家、思想家包括黑格尔、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还是从近代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李约瑟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到这种深邃的思想。我们不好说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更为博大精深，但我们能够、并可以说毛泽东的经济发展战略思想更符合现代社会主义中国国情。

（一）发展经济就是为了人民

在大革命时期，从战略上看，要想革命取得最后胜利，首先，关键

的是要有革命人的存在。在回答中国的红色政权能不能存在的问题时，毛泽东就提出每个党员要注意“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红色政权要能够存在，人是第一位的，这个“人”就是红军的每一个战士及其支持红军的人民群众，当时的经济活动不围绕着“人”来进行，经济问题不解决，革命人难以活下去，红色政权就存在不下去。

井冈山的斗争，红色政权没收一切土地重新分配，努力同根据地外部进行贸易、税收和打土豪筹款等等，这些都是经济工作，就是为了发展根据地经济，一方面确保红军供给，一方面减少对人民的消极影响，还致力于不让“日常生活压迫，影响中间阶级反水”（毛泽东：《井冈山的斗争》）。从政治与经济的结合上来说，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实际上就是很好地利用了军阀混战使人民赋税加重、帝国主义的商品侵略、中国商业资本的剥蚀、地主地租和高利贷的剥削、学生有失学之忧和无就业之望，产生了国货商人和独立生产者日益走上破产的道路，广大农民和城市贫民走上求生不得的道路等矛盾的混乱的社会状况，从而振臂高呼，宣传、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起来进行革命，最终由星星之火，形成了燎原之势的革命形势。这些，在毛泽东《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论著中我们可以看到和领悟到：革命的形成或者胜利、或者失败，从根本上来讲是由对人的生存的条件，即经济发展、经济问题的解决与否所决定的。我们都知道毛泽东农村包围城市的论断，更应该知道毛泽东是从经济问题入手，或者讲是从经济发展战略思维上去实现这个伟大的革命意图的。如同毛泽东指出的那样：“目前我们对农民应当领导他们极力做政治斗争，期于彻底推翻地主权力。并随即开始经济斗争，期于根本解决贫农的土地及其他经济问题。”（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由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政治斗争也好，经济斗争也罢，不是为了人而产生而存在，那是没有什么作用和成效的。

从现实上看，我国居民劳动报酬占GDP的比重，在1983年达到56.5%的峰值后就持续下降，2005年已经下降到36.7%，22年间下降了近20个百分点。而从1978年到2005年，与劳动报酬持续下降形成了鲜明对比的，是资本报酬占GDP的比重上升了20个百分点（引自《报刊文

摘》2011年5月13日第2版)。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实际后果从为人转变成为更多地是为资本,以致出现了许许多多的社会矛盾,事实提醒我们,需要正确思考经济发展的战略问题。

也许,我们在现实中对发展经济、经济发展的思维和实践,在策略上,在某个特定阶段可以暂时不为人(但是,这个特定阶段只能是短暂的,否则便会积重难返)。然而在战略上,发展必须是为人民。

(二) 发展经济必须真心实意依靠人民

在毛泽东的思维里,人是第一位的东西。他认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毛泽东:《论联合政府》)他指出:“人民群众有无限的创造力。他们可以组织起来,向一切可以发挥自己力量的地方和部门进军,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替自己创造日益增多的福利事业。”(引自毛泽东对《多余劳动力找到了出路》一文写的按语)没有哪一件事,能比由于脱离人民群众,受人民群众所唾弃更可悲、更为失败。群众路线之所以能上升到中国共产党“三大法宝”的地位,表明共产党对依靠人民这种真理的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

毛泽东深刻认识群众的力量和作用,凡事要依靠人的开拓。井冈山时期,中国红色政权能否存在,从战略上讲,关键在经济问题能不能解决,在于党能不能“对经济有一个适当的办法”。毛泽东严峻地指出:“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均引自毛泽东:《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因此,井冈山斗争时期,根据地没收土地重新分配,征税,与外部进行贸易交流,甚至红军总司令也扛起扁担下山挑粮,成了红军中每个人的积极实践。随着革命发展和队伍的扩大,毛泽东及时地指出:“革命战争的激烈发展,要求我们动员群众,立即开展经济战线上的运动,进行各项必要和可能的经济建设事业。”如果不能把“群众的热情提高起来”,让“群众都加入经济战线上”(均引自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想要达到革命战争胜利的目的是不可能的。

事实上,毛泽东在他的整个革命生涯中,在他的一生革命建设实践中,都把依靠人民群众、激发人民群众的全部积极性和热情,动员和组

织人民群众放在第一位，从不松懈，从不忽略。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应当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该实行，应该检查。要使广大群众认识我们是代表他们的利益的，是和他们呼吸相通的。要使他们从这些事情出发，了解我们提出来的更高的任务，革命战争的任务，拥护革命，把革命推到全国去，接受我们的政治号召，为革命的胜利斗争到底”（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要求“善于把党的政策变为群众的行动，善于使我们的每一个运动，每一个斗争，不但领导干部懂得，而且广大的群众都能懂得”（毛泽东：《对晋绥日报编辑人员的谈话》）。“我党二十几年来，天天做群众工作，近十几年来，天天讲群众路线。我们历来主张革命要依靠人民群众，大家动手，反对只依靠少数人发号施令”（同上）。毛泽东提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必须坚持群众路线，放手群众，大搞群众运动。”（转引自1967年8月30日《人民日报》）“要信任群众，依靠群众，尊重群众的首创精神。要放手发动群众，让群众自己起来革命，自己教育自己，自己管理自己，自己解放自己”（转引自1966年6月20日《人民日报》）。毛泽东从来都认为，没有群众的觉悟和群众的共同奋斗，任何事情都难以做好。脱离了人民群众，我们将一事无成。

（三）发展经济的成果须由人民共同分享

这是唤起民众，极大地调动广大人民群众置身参与事业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的正确的战略策略。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曾经严峻地指出：“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毛泽东：《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民心的向背，人民积极性的向背，完全决定了战争的胜负。那么，怎样才能获得民心，如何调动起人民的积极性呢？在《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这篇讲话里，毛泽东告诉人们：“我们应该深刻地注意群众生活的问题，从土地、劳动问题，到柴米油盐问题。……一切这些群众生活上的问题，都应该把它提到自己的议事日程上。应该讨论，应该决定，应

该实行，应该检查。”

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也不是铁石心肠，每个人都有血有肉有情感，知良善，识好丑。谁对他有好处，谁只在他们身上占便宜；谁解决他们的真实问题，谁骗了他们，谁给他们添难题；谁关心他们，谁鄙视他们，羞辱他们，每个人都是做到心中有数，只不过每个人对这些问题的反应，所采取的态度和方式方法都不尽相同而已。中国共产党之所以得民心，是因为共产党能让人民群众感到共产党的好处，能真正解决得了他们的实际问题，亲身体会和感觉到共产党是真正的关心人民群众。而有了共产党，人民群众就不用担心任何人敢于去鄙视他们，羞辱他们，以至欺侮他们。人民群众能过上舒心的日子，当然就会转过来拥护共产党，赞同共产党的主张，支持并积极参与共产党领导的一切事业。

在理论上，毛泽东反复强调：“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毛泽东：《两个中国之命运》），“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毛泽东：《论联合政府》）。强调：“国家机关实行民主集中制，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必须为人民服务”（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强调“我们的责任，是向人民负责。每句话，每个行动，每项政策，都要适合人民的利益，如果有了错误，定要改正，这就叫向人民负责”（毛泽东：《抗日战争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这些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是为人民谋利益而思考，从人民的利益出发制定行动纲领和政策，为人民利益去奋斗，为人民服务的。

在实践方面，即使是在非常困难的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在中央苏区实行的是“我们的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毛泽东：《我们的经济政策》）。其出发点和目的，毛泽东讲得很清楚：“是进行一切可能的和必须的经济方面的建设，集中经济力量供给战争，同时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同上）。这一时期，党不仅是提出关心群众生活问题，而且具体要“解决群众的穿衣问题、吃饭问题、住房问题、柴米油盐问题、疾病卫生问题和婚姻

问题”。要满足群众的需要，真正成为群众生活的组织者和保障者。毛泽东以兴国县长冈乡的实例说明问题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乡里“有一个贫苦农民被火烧掉一间半房子，乡政府就发动群众捐钱帮助他。有三个人没有饭吃，乡政府和互济会就马上捐米来救济他们。去年夏荒，乡政府从两百多里的公略县办了米来救济群众”。正是这些至今不起眼的小事，把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共产党及其领导的革命的积极性极大地调动起来了。当时，长冈乡青壮年男女百人中有八十个去当红军，福建上杭县才溪乡百个人中有八十八个当红军。这充分证明了让人民群众分享工作、事业、胜利成果的无形威力。我们翻开党的历史，是可以发现当时由于共产政策的施行，红色根据地内不仅有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也是得到很大提高的。

二、毛泽东经济战略思想具有极强的对国家、民族、人民的有益性

大家知道，经济就是经世济国，本质是对社会对国家有益的事。发展经济就是要做好对富民强国、社会和谐有利有益的事。对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没有益的经济事业，即使有增长，也是不该做的。由此，我们想到了“标准”的问题。经济工作，经济发展的正确标准，就是对自己的国家、对本民族、对人民有益（这个“人民”应当是，也只能是绝大多数人）。比如，最近暴露的央企海外并购频现的恶性竞争，互相抬价，自挖墙脚，“窝里斗”，“一家公司旗下的两家分公司为抢夺同一个项目，报价可以相差1亿元”；在澳大利亚收购铁矿石时，几家央企都看中一处矿山，最终国内企业相互抬价，成交价格比原来高了1/3（据2011年5月10日《21世纪经济报道》、2011年5月13日《报刊文摘》）。这样的经济行为，这种经济事业应当不能说是国家、对民族、对人民是有益的。至于那些污染、破坏、浪费环境资源的所谓增长，那就更不用说了。毛泽东是个未进过“经济科班”的领导者，然而，在他的关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的战略思维里，都是确切切切地把有益性放在第一位，或者讲始终摆在突出的重要地位上的。

（一）发展经济要有益于民生

应当讲，毛泽东不仅在发展经济上有强烈的民生愿望，而且在进行政治思考，在革命的起因方面，往往也首先从民生上去考虑。民生问题受到了大的威胁，老百姓的生存愿望和生存条件都得不到应有的保障了，不起来革命，就活不下去，他们能不思考通过革命去寻求一条生存发展的路子吗？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工人“并不是随着工业的进步而上升，而是愈来愈降到本阶级的生存条件以下”。这明确地告诉人们，在资本主义社会里，资产阶级的残酷剥削是制造暴力革命的根源。毛泽东之所以写下《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就是他要从民生的角度去思考政治，思考革命。确实，在生存得到保障，经济来源不错，不仅能生活稳定，而且能不断改善和提高的情况下，谁会愿意去“抛头颅，洒热血”，不惜牺牲性命呢？在一个纷乱的社会，社会要产生重新组合情况下，当然主流就是“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是穷帮穷、亲帮亲。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对于农民运动的道理，从农民及从事农运工作的人那里，与地主绅士阶级是完全不同的。其根源，正是经济地位所决定。

正是由于看问题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方法不同，毛泽东关于经济发展、发展经济的战略思考首先是以民生为主导，就是顺理成章的了。中国的红色政权发生“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这里民众的政治的、经济的条件非常恶劣。毛泽东当时就是首先从民生问题，即“因为敌人的严密封锁，食盐、布匹、药材等日用必需品，无时不在十分缺乏和十分昂贵之中，因此引起工农小资产阶级群众和红军士兵群众的生活的不安，有时真是到了极度”，而提出“这个经济问题的相当的解决，实在值得每个党员注意”（均引自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经济工作就是要解决民生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了，红色政权才能存在和发展。

随着革命战争的发展，能否激发人民群众拥护、支持和参加革命战争的积极性，其基本点也在于能否保障和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即民生方面。因此，毛泽东提出：“各级政府的主席团、国民经济部和财政部的

同志，要把发行公债，发展合作社，调剂粮食，发展生产，发展贸易这些工作，经常地放在议事日程上面去讨论，去督促，去检查”，动员、组织、带领群众去把经济工作做好，推动经济发展。“发展了国民经济，改良了群众生活，无疑地就会极大地帮助扩大红军的工作，使广大群众踊跃地开向前线去”（均引自毛泽东：《必须注意经济工作》）。同样是民生决定革命战争的发展与胜负，因而才有根据地经济建设的中心是发展农业生产，发展工业生产，发展对外贸易和发展合作社；经济政策的重要原则之一是极力改良民众的生活。1934年1月，毛泽东在江西瑞金召集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会上指出：“有两个问题，同志们在讨论中没有着重注意”，“第一个问题是关心群众生活问题”，“一切群众的实际生活问题，都是我们应当注意的问题。假如我们对这些问题注意了，解决了，满足了群众的需要，我们就真正成了群众生活的组织者，群众就会真正围绕在我们的周围，热烈地拥护我们”。

抗日战争进入了最艰苦阶段，毛泽东提出了“发展经济，保障供给”的经济工作和财政工作总方针。告诫人们：“如果不发展人民经济和公营经济，我们就只有束手待毙，财政困难，只有从切切实实的有效的经济发展上才能解决。”他严肃指出“不顾人民困难，只顾政府和军队的需要”的发展是错误观点，是“竭泽而渔，诛求无已”。同时提出了以“精简、统一、效能、节约和反对官僚主义”为目的的精兵简政措施，指示开展根据地的减租、生产和拥政爱民运动，以此减轻人民负担，搞好人民与政府与军队的关系（均引自毛泽东：《抗日时期的经济问题和财政问题》）。毛泽东认为，解决好民生这个重大问题，需要学会做经济工作，需要自己动手，依靠外力并不是解决的根本方法，“不能学国民党那样，自己不动手专靠外国人，连棉布这样的日用品也要依靠外国。我们是主张自力更生的。我们希望有外援，但是我们不能依赖它，我们依靠自己的努力，依靠全体军民的创造力”。提醒人们，要有长期打算，既要注意节省人力物力，又要注意发展生产（均引自毛泽东：《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1944年5月22日，毛泽东在一个招待会上指出：“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

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毛泽东：《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

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面对中国革命即将取得胜利、新中国即将诞生的大好形势，毛泽东指出，党的工作重心要发生转移。但是，“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这就是毛泽东一贯的经济发展战略的大民生原则的充分体现。中国毕竟是农村农民占人口多数的大国。可以说，直至现在，农村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发展和富强、社会的和谐都无法解决。我们一定要从民生的根本问题上思考经济发展的路子和方式。

（二）发展经济必须有益于国家

我们知道，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其行动的每一个谋划，必须是从有益于她本国来思考。应该说，这是一个大原则、大方向。如果对本国无益，那么“发展”过程中的人力物力资源消耗，产生的对环境对人民群众的消极影响的东西，如污染，都要由本国及人民作无酬报的负担，甚至直接伤害了自己的国家和人民，那就不仅仅是得不偿失的问题，而只能是有失无报了。这样的所谓“增长”、“发展”，不要也罢。但是，如果要测评“发展”对本国的有益性或无益性，在实际上却存在着截然相反的看法和测度，需要人们真正地抱着科学的实事求是的态度，需要有一定的战略眼光和正义判断。

大革命时期，毛泽东为什么将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列入革命的敌人之列，实则首先是从经济发展战略思考出发的。他指出：“在经济落后的半殖民地的中国，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帝国主义的。这些阶级代表中国最落后的和最反动的生产关系，阻碍中国生产力的发展。”（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也就是说，当时的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由于其地位及其本性，他们的经济工作和发展思维，除了要有益于他们自己之外，只能是对外国资产阶级有益，而对他们自身的有益性最终也是对外国资产阶级更有益。不推翻他们，对革命、对国家、对人民群众都是没有利的。